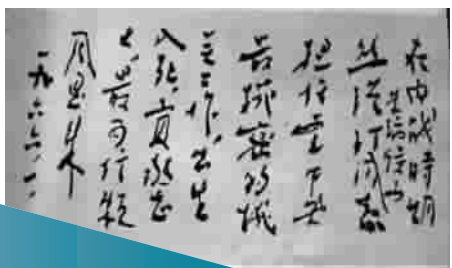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▲ 愚园路 1376 弄 34 号,《布尔塞维克》编辑部旧址



周恩来给熊瑾玎的手书



斗争的故事 机关上海地下 中共中央 『红飘带』 夜幕中的

◆ 李忆庐

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,中共中央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。在自区斗争最险恶的年代,一批革命先驱机智地将中央机关隐蔽在上海的弄堂和亭子间里。他们既是革命者,也是媒体人,在理论和行动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。

1927—1931 年,中共最高中央机关蛰伏在上海闹市区——天蟾舞台隔壁,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办公。邓颖超化名“伍美”,创办了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《支部生活》。上海作为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活动基地,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迹。本文中关于“志夫新话”、“伍美”书记工作和地下工作组织纪律等方面的细节都是首次披露。

吊起脑袋干革命

大革命失败后,周恩来于 1927 年 11 月来到上海,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,直至 1931 年 12 月上旬撤往江西苏区。在上海长达四年之久的秘密工作中,他恢复和壮大了上海的党组织,创立了中央特科,在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中,他领导革命者们创立很多地下工作的绝招。

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,中共地下党经常有人被捕,更有可耻的叛徒告密出卖党内同志。为确保人身安全,革命者不得不时常变更住所,像周恩来在一地居住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,往往只住半个月,而且每换一个地方,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,从不疏忽。尤其是对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,从不超过两三人。周恩来外出时经常化装,最简单的化装莫过于留起大胡子,即使熟人也很难辨认,因此党内很多人也称其为“胡公”,一般打交道的人,还以为他是一位姓胡的商人呢。

也正是在周恩来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的坚持下,党内在长期地下工作中初创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方法,例如严格规定秘密文件的有限保存数量,绝不容许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,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。1928 年 5 月 31 日,中央组织科印发《秘密工作常识》,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。因为工作,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曾出现“家庭化”的特征,在五方杂处的大上海,除了必不可少的机关外,大部分党的机关都设在革命者的家里。每位革命者在社会上都有公开的职业,从而使得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真正得到群众的掩护。邓小平后来曾回忆:“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,非常艰苦,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。我们没照过相,连电影院也没去过。”

1931 年,中共早期领导人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抓获,随即变节投敌。闻讯后,周恩来、邓颖超深夜避难于虹口北四川路永安里 44 号(今四川北路 1953 弄 44 号),隐蔽在周恩来的堂哥周恩霖(字润民)的家里,直至同年 12 月初离开上海,经广东汕头、大埔,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,12 月底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。之后,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也陆续转移出去,如今云南中路 171—173 号六大后的中央机构、愚园路 1367 弄《布尔塞维克》编辑部旧址、四川北路 1953 弄的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等老建筑依然镌刻着往日的峥嵘岁月。

你好,“伍美”书记

“7·15”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,邓颖超奉党组织之命由湖北来到上海,“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,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”。

邓颖超抵达上海后,很快恢复了中央妇委组织,并担任书记。妇委委员有蔡畅、杨之华、李文宜、庄东晓等八人,她们开会时以“姐妹相聚,在一起玩玩小牌”为掩护;按年龄排列,蔡畅排行老大,被称为“大姐”,邓颖超是五妹,她用五妹的谐音“伍美”作化名。

1928 年下半年,随着中共中央

机关的逐渐完善,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(简称“直支”,代号“植枝”),由邓颖超担任“直支”书记,其他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,后来增至七人。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,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,是共产党“生存和发展之一最重要的问题”。1925 年中共四大上,决定将组织建设的重点落在支部建设上。为此,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,改为“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”。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“组”改为“支部”。至今,支部、党小组等概念仍在沿用。

受欢迎的“志夫新话”

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,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,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布尔塞维克》(即布尔什维克)和《红旗》等。《布尔塞维克》由瞿秋白、罗亦农、邓中夏等人编辑,今天的愚园路 1367 弄 34 号就是《布尔塞维克》编辑部旧址。为了增强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,搞活支部建设,邓颖超与“直支”其他成员商量,决定创办一份刊物《支部生活》。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,并由中央组织部向“直支”建议:做《支部生活》的编辑,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,要聚焦热点问题。“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,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,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,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。”

1929 年 1 月 26 日,《支部生活》在上海问世,由邓颖超兼任主编。该刊为 12 开本,以毛边纸印刷,每月出版 1—2 期,每期字数在 5000 字至 1 万字。《支部生活》经常刊登各党小组的活动内容,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,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,为隐蔽工作的革命者,送来革命动态的“及时雨”。如今,《支部生活》的部分期数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,透过泛黄的纸张,展读手写的油印本,往日的革命风云宛如昨日。



■ 《支部生活》第 26 期的目录



■ 1926 年 8 月 8 日,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汕头拍摄的结婚周年合影



■ 四川北路 1953 弄 44 号永安里

“熊老板”办布庄

1927 年蒋介石发动“4·12”反革命政变后,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,但旋即武汉又发生“7·15”反革命事变,9 月,中共中央被迫再次迁回上海,最高机关隐蔽在上海公共租界内。根据周恩来的指示,实行机关家庭化、党员职业化的隐蔽工作模式。

1928 年,中共地下党员熊瑾玎以商人的身份租下公共租界云南南路 447 号(今黄浦区云南中路 171 号至 173 号)生黎医院二楼的三个房间,设立中共政治局机关。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层为生黎医院,紧靠熙熙攘攘的上海四马路(今福州路),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台,从舞台西侧的一座楼梯可直接进入二楼房间,对面有座妓院,是公共租界灯红酒绿的混杂之地。

熊瑾玎担任六大后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会计,夫人朱端绶担负抄写和传送中央文件的任务,在房间二楼挂出“福兴”商号的招牌,以经营纱布生意为幌子,便于掩护人员进出。熊瑾玎身任中央会计,平时他以商人身份,为筹集经费和建立联络点,主持开设了酒店、钱庄,还同毛泽民经营了“集成印刷厂”,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,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,还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。这些经营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。

在险恶的形势下,钢铁般的秘密工作原则被视为共产党生存的基本条件。党内规定:“秘密组织的规律,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,秘密机关的地址,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。”三年中,经常来往的中央同志有二三十人,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李立三、李维汉、关向应、李富春、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在这里开会办公,大家均执行严密的工作纪律。得益于熊、朱两人很好的保护,党中央同志亲昵地称夫妇二人为“老板”“老板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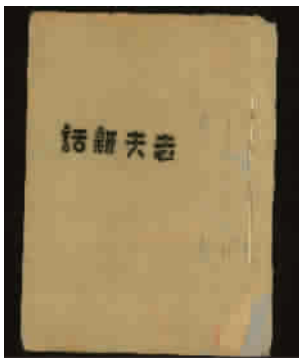
六大后的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,主管文书、机要、交通、财务等工作。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处(今青海路 19 弄 21 号、西康路 24 弄 11 号)办公至 1929 年 8 月,他常来生黎医院二楼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。1930 年 2 月初至 4 月,他秘密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,在上海又工作了两个月。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,“熊老板”的布庄——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,这个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存在达三年之久。直到 1931 年顾顺章被捕叛变,此处才停止办公。



■ 1946 年,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南京梅园的合影



■ 1946 年 8 月拍摄的云南中路 171—173 号,那里在中共六大后作为中共政治局机关所在地



■ 《支部生活》第 26 期的封面被伪装成《志夫新话》



■ 熊瑾玎、朱端绶夫妇合影